

从古蜀仙国到洞天福地

——成都市青羊区旅游文化的性质及其特征

谭继和

2000 多年来，成都城市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城名不改；二是城址未迁；三是唐代以前，成都城垣内西为少城，东为大城，一城两制。唐初以来，迄至 1960 年，城西为成都县，城东与城南为华阳县，一城两治。青羊区是 1991 年成都市组建的新区之一。它的辖境包含了古少城全境在内，也包含了成都县的核心部分。由于历史上一城两县治长达千余年之久，因而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积累，使青羊区承袭了更多的古少城的特色和原成都县的历史遗产，构成今日青羊区的区域文化特色。这些特色，对于今日青羊区发展旅游业的文化定位和市场营销定位影响甚巨。这里试作一些探讨。

一、老城五区的区域文化特征

十六年前，我曾撰文论述成都城市文化的性质，认为其基本性质是以都江堰为源头的，以“水利殖养其国”的农业文化和静穆的农业生活方式，同以“市张列肆，货贿山积”为特征的古典城市工商文化和动态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工商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其结果是构成了蜀文明的内涵和特征。这是就整个成都城市来立论的。如果细分起来，成都城市内部不同区域，还有其不同

的特征，其民风民俗、民之禀性和民之气运，也还有些区别。以今日的区划而论，北面的金牛区、西面的青羊区、南面的武侯区，大体构成城西文化圈。而东北的成华区和东南的锦江区，则大体构成为城东文化圈。巡检城西和城东两个文化圈从古及今发展的历史，大体可在文化上做如下的区别：

一是从历史流向看，成都城西文化圈是成都城市经济和文化最先发展起来的区域，而城东文化圈则是稍滞后的区域。由于都江堰扇形水系的影响，成都的经济和文化最先从平原西北沿若干扇形两江之间的鱼脊台地上发生出来，然后向东南发展和传播。所以，成都之东和之南发展要滞后得多。到中唐以后，韦皋在大慈寺前穿解玉溪，开辟东市，成都才开始了它的经济和文化向东和向南开发和发展的历程。但这个历史进程到现在也未能完成。所以，今天才提出了建立城东副中心和城南副中心，整个城市向东向南发展的战略。因此之故，青羊区应该是最先受城西发展之惠的区域。

二是从文化的始源看，成都文化最先发展起来的、历时性最长的是农业文明，其主要特征是通过以“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治水方法清理水患而发展农业的泽地文明。成都平原古为一片湿漉浸沃的泽地，是靠从大禹到鳖灵到李冰治水，对成都平原水系采用连环套似的、内外江分流的办法，向东不断分沱以利排洪，农业耕种才发展起来，这就叫“东别为沱”。就成都城地势而论，古沙河（古升仙水，又称凤凰水）就是二江“东别为沱”的产物。《成都通览》说：“清水河”和“磨底河”古称沱江，这说明清水河和磨底河也是平原上“东别为沱”的产物。这两条河都在青羊区内。如果从龙爪堰观察，干河、浣花溪和清水河如龙爪之形分流，这也是“东别为沱”。成都平原的河道多经过了人工整理，多是在自然河流基础上穿整出来的人工运河。这些人工运河使扇形水系之间的高地突显出来，发展出丰腴之地、天府

之国、陆海之乡的优越农业，这才有古代浣花大游江的情景和今日浣花风景区的景致。青羊区恰恰具有最先受泽地文明成果之赐的条件，是承接泽地农业遗产的最佳受益者之一区。

泽地文明是中国农业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如鲁有大野（钜野）泽，晋有大陆（广河）泽，秦有杨隄、具圃泽，宋有孟诸泽，楚有云泽梦泽，吴越之间有震泽，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周有焦护泽。以上系《尔雅》所说的十藪，即十个大泽。《尔雅》未说到西南。其实西南的泽也不少，如滇有滇池、千顷池。蜀有“陆海”（见《华阳国志》），还有个专门称呼，叫做“梦郭”。所谓开明王自“梦郭”移，乃都成都，指的就是把“梦郭”泽地整理出来。泽地是文明最先发展的区域，泽地文明是巴蜀区域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成都平原泽地文明的走向，正好同今日的考古发现相一致。如将广汉三星堆古遗址，月亮湾遗址，彭州濛阳镇竹瓦街窖址，新都马家大墓遗址，金牛黄忠遗址，青羊区内的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和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直到指挥街遗址连接起来，正好构成了成都平原从北向南一条古文化发展的纵线。这条纵线是最典型的泽地文明产生和发展的生命线。今青羊区区域正好是这条古泽地文明线的南端，而北端在广汉三星堆。由此可见，青羊区居于古文明诞生的优越区域。由广汉三星堆纵贯而南直到金沙遗址等地，这条南北纵贯的泽地文明线，应该是今日旅游的黄金线，大大值得我们注目和重视。

三是从人居环境的建筑基线看，从浣花溪到古宣华苑、摩柯池（今展览馆、天府广场），正在府河和锦江环抱的源头区域，这条线自古即是成都人居建筑的基线。“西望少城花满眼”，沿这条基线发展起来的民居，是相对安静、幽邃、有文化层次的区域。特别是沿浣花溪和二江环抱发展起来的民居聚落，自古即是成都最富有、最豪华、最静谧的文化人居区域。直到今日，这条富有、安静的人居建筑基线也还未受到破坏，分布着不少环境优

雅的居住社区，其地理文脉一直承传着，这是比城东文化圈有优势的地方，值得青羊区和武侯区重视和珍惜，千万别用“建设性的破坏”去代替了它。

四是从文化的时代内涵看，城西文化圈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深厚一些，城东文化圈的现代感和开敞感更强烈一些；城西文化传统化强烈一些，城东文化现代化强烈一些。表现在建筑风格和色彩上，城西的古典性强一些，城东的时尚性强一些。根据这样的历史特点，青羊区的建筑与环境、文化建设与人文教育应更多考虑传统化、古典性和历史文化特色的传承和弘扬，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总之，今日成都老城的五大区域，从文化学角度看，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各有自身的独特资源和独特文脉，是我们今日经营城市，变资源为资本所特别要注意研究之处。如果对各自区域的文化内涵、基本性质和基本特征把握不住，要发展本区域内的有特色的文化和旅游，就会出现困难，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青羊区的区域文化特征

青羊区现有区域，是成都历史上有悠久文化始源并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之一，经累代成都人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已积累了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为我们今天成都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从今日旅游学的视角观察，青羊区旅游文化的性质是多元性，有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古蜀都邑文化，有商业街战国早期开明王族船棺葬遗址文化，有文翁石室为代表的蜀学，有君平街为标志的蜀易学大师严君平的卜筮文化，有杜甫草堂的草堂文化，有浣花“遨头宴”和百花潭为代表的大游江、小游江的游乐文化，有文殊院为代表的宗教性旅游——禅游文化，有青

羊宫为代表的仙道文化，还有努力餐、祠堂街和十二桥烈士墓为标志的近代革命文化，也还有苏坡乡的东坡读书台为标志的东坡文化（潜质尚待发掘）等等。当然，还有陕西会馆的会馆文化和清真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少城区域的少城文化、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为代表的保路运动文化内涵等，可见其文化的多元性。这样多元的文化，可谓如珠玉满盆，皆是有用的旅游资源，皆具有资源变资本的价值。但要从青羊区的角度讲，则需要注意这些资源如何整合的问题。正如满盆珠玉需要金线穿珠一样，需要在多元化的文化中找出贯穿众多珠玉的主体文化或品牌文化来。这个品牌就是古蜀仙国到洞天福地的仙游文化，这应该是青羊区旅游文化最大的特色。

古蜀文明从其始源和早期发展历程看，经历了古蜀文化、古城、古国和古方国几个发展阶段。从广汉三星堆遗址到月亮湾遗址，到彭山的濠阳镇发掘的殷代二觚为特征的青铜器窖藏，再到新都古蜀王马家大墓再到金沙遗址，这条由北向南发展的文化轴线，刚好是殷商以来的古蜀文明发展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的北头是三星堆，它的上源串联起成都平原西北和西南边缘的现已发掘出七座古城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它的南头是青羊区的金沙遗址，它的下源则串联起商业街战国早期开明王族的船棺葬遗址。这条中轴线的两翼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众多遗址，如指挥街、青羊宫，直到殷商西周的黄忠遗址、十二桥遗址，直到青羊宫隋唐窑址。这条中轴线左翼往北则串联起羊子山西周时期的祭台遗址和凤凰山的羽人凤鸟飞升成仙的仙文化。

青羊区域正是这条文化发展链的中轴线的南端，是古蜀都邑文化的结穴处。它的始源是成都平原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文明，它的形成和发展的鼎盛时期则是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王国都邑。它向平原中心迁徙和最终定点的标志则是金沙遗址所昭示的从今金沙村到今商业街区域的古蜀都邑文化。青羊区正是古

蜀都邑文化发展链由北向南来的定居结穴处，古称这一带为少城区域。今成都城址就是这条文化中轴线发展的结果。少城者，最先发展起来的区域。大城则是后发展的区域。正如少皞是先于太皞发展起来的部族，少室山是夏文化最先发展的地方而后扩展到太室山一样；“少”是最小最早的意思；“大”和“太”是大和晚出的意思。成都城就是从少城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成都最早的商业区和市场也诞生于少城，秦国设“市长”管理少城市场，这“市长”一职最早也产生于少城商业区，到今天市长的涵义已大不一样，但它的来源则在这里。如此说来，青羊区域包含了古蜀少城区域，是古蜀王国以成都为都邑和都市的最早发源地，这是历史给予的今日青羊区的优势。这种成都城市文化发展定型化的源头和结穴处地位，以及这几个古成都文化的“第一”，是青羊区旅游的头号品牌资源。

更进一步说，古蜀都邑文化是重仙的文化，这是其本质特征。中原文化重礼，以《诗经》为元典。楚文化重巫，以《楚辞》为元典。巴人重鬼；其人豪，其俗重鬼；以丰都鬼文化为代表。蜀文化则是重仙。蜀王仙化的传说很早。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皆“得仙道”，其民亦随王化去。“上古时，蜀之君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这些是蜀人仙化想象力的真实记载。杜宇魂魄化为杜鹃啼白；“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也是仙化。开明鳖灵也有神化故事。仙字古写为“僊”，就是迁徙的“遷”，二字同源，仙化就是“遷”(迁)化，迁来迁去，引起浪漫想象，就成了僊(仙)。这种迁徙活动被称为“遷(迁)”，而迁徙的主人则被称为“僊”(仙)，蜀人的仙化思维就是这么来的。蜀人仙化的文化代表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言神仙之事”，写到处迁游的仙人，汉武帝“好仙道”，读之飘飘欲仙。司马相如的琴台故里在青羊区域内（古笮桥附近），仙化思维结晶的文化代表出在青羊区域，这是青羊区的“福份”。后来道教借

用了这个“仙”字，构成了“神仙”一词，仍含有迁徙变化之义，但被提升为羽化升仙的幻化境界。青羊宫的前身源于青羊肆。老子骑驴遇关令尹喜于青羊肆，这一传说正是古蜀人仙化思维的产物，而其地址也恰在青羊区。

古严真观遗址在今支机石街西面空地，原立有支机石。现支机石早已移往文化公园，而遗址空地早已为华屋所占据。明·曹学佺·《蜀中广记》曾记述张騫与严君平相会故事。张騫出使大夏，直到黄河源头。回程时，仙人赠了一块石头在张騫的船上，要他回来询问蜀人严君平，要他道出由来。张騫归问严君平，严答复说：去年八月星象有客星入侵牛郎织女星，这是你乘仙槎到达日月之边，与牛郎织女在晤谈，这块石头就是织女支撑织机的垫石。这个仙化故事是蜀人的传说，唐诗人岑参《卜肆》曰：“君平曾卖卜，卜肆著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可见早在唐代以前，蜀人就有了严真仙化的传说。这个传说因严真卖卜遗址处的大石而起，而大石文化又是成都平原早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与许多仙化故事，如海眼故事、风雷撼石故事等牵连到一起，成为蜀人仙化想象力的重要载体。从上述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蜀人的文化创造力，多用在仙化和幻化方面，用今天的术语讲，就叫做蜀人多浪漫主义，多球型思维，想象力和联想性丰富。所以，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到苏轼到杨升庵到张问陶再到李调元直到郭沫若，都是富于文学的浪漫主义或学术的大胆假设和想象能力的“文章冠天下”的文化巨人，这些同蜀人的发散性球型思维有极大的关系，而其渊源则在古蜀人的仙化思维模式里。而所有这些故事，多少都同今青羊区地域有关，这是青羊区一笔非物质的宝贵文化遗产资源。

从考古发现看，三星堆的鸟首人身像、人面鸟羽像以及诡异金铜人面像和众多凤鸟，是蜀人的羽人飞升思想最早的渊源。百

花潭中学的和青羊宫的战国青铜壶上的仙人羽化形象，则是蜀人仙化想象力的物证。至于殷商时期的金沙遗址的飞鸟形象、立人形象，更是蜀人仙化思维的推波助澜处。这些考古例证，均同青羊区有关。因此，古人建道教宫观青羊宫选择在青羊区内，而不选择在成都城的其它区域，实在是因为这种仙化和道化的思维多积淀在城市西边之故，这种思维所体现的地理文脉载体也集中在城市西边之故。

由上述论证言之，从古蜀仙国（金沙都邑）到洞天福地（青羊肆和青羊宫为代表），这个千百年来文化发展历程，所孕育出的仙游文化，实是青羊区旅游文化最重要的特征。

青羊区旅游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文殊院为代表的禅游文化。

文殊院是川西四大禅林之首，禅僧和禅学是唐以来文殊院的特色。今日作为旅游来利用和开发文殊院的资源，应首重一个“禅”字。

其实，人生在世，无非一个“游”字。游于山，游于水，游于学，游于宦，游于世井，游于净土，几曾脱离一个“游”字？故“游戏人生”一语，若从禅理看，则为旷达之语，世间色相有无，皆为游也，戏也。于游戏一入一息之间，明心开悟是一理，愤世嫉俗是一理，穷极观照是一理，返朴如难于皈真，仍可算是一理。这游戏禅机之理的极致就是“意象虚灵”。能真悟此“意象虚灵”，即蜀人张问陶所主张的“真性灵”，则可能达到旅游的心理体验的最高境界。

文化内涵是旅游的生命。文化心理的美感视觉和性灵感应，是旅游者高级心理层次的体验，是境界最高的旅游。旅游有可能经历三种境界：第一境是物我相谐，引起适豫感。第二境是物我相融，这就是禅的初悟。第三境是物我两忘，其自然度、美感和灵感度达到高度的和合一致，体味自然与人文相融相交的“中和美”，激发人创造的灵感，这是禅的开悟，也是旅行家追求的

最高境界。用这三境界的心理体验来游文殊院，自可在表面的求神拜佛仪轨中，真正体味到禅的意味和价值来。我认为青羊区依托文殊院历史文化保护片区，就必须重视“禅游”，而且应培养出能引导游客经历三境界的高水平导游。这样就可从普通的寺庙宫观旅游，提升为以“禅”为主题的禅游。只要了解其文化内涵，就定然能够游出禅位来，游出逸兴壮思俱飞扬的诗兴来。文殊院住持宗性法师的诗云：“南来北往任西东，山色如黛画图中。惊涛骇浪三千界，尘尘刹刹落九峰。”这就是禅——禅诗、禅境、禅心的精髓所在。倡导禅游，就是要游出这种禅味来。我想这对提高目前观光旅游的层次是会大有帮助的。

第三个特征是以杜甫草堂为中心的诗游。“诗游”是旅游者必备的素质，至少在古代是如此。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于 669 年 5 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个人观光旅游最早的记录。杜甫与高适人日草堂互相酬唱以后，宋代以降兴起了人日游草堂赛诗歌的习俗，可见古人旅游与咏吟诗词是分不开的。今日很多人游草堂，已经失去了吟诗作颂、雅游胜赏的素质，倒多了一重“游必麻将”的韵味，这实在难称高雅，很难说有什么高级层次的旅游心理体验。

“自古诗人例到蜀”，自古蜀中也出诗人。杜甫、陆游都是寓蜀而靠蜀的江山形胜孕育出诗风大变的诗篇，成就为伟大的诗人；“大块假我以文章”，他们都是蜀中山水熏陶的结晶，游杜甫草堂，体验的就是这个诗味，由此而引发出诗兴。现在，每年一度的人日诗歌吟唱会渐成习俗，但还不普遍。“人日游”还大有发展余地，还大有文章可做，青羊区似可于此多加研究。甚至再想浪漫点，古人的入日草堂诗歌游，能否发展为今人的入日草堂国际诗歌节，邀请各国各派诗人，如英国的沙氏乐府（十四行）诗人、日本的俳句诗人、印度的行吟诗人以及各种浪漫派、抽象

派诗人等等，来与中国传统诗词和新派诗人共度人日节，恢弘汉唐吐纳海内外的文化交流雄风，此番乐事不亦可为乎！这里，姑且作为一个老政协委员向青羊区有关领导的一个建言吧，也许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第四个特征是近代少城文化。其主要特征是宽窄巷子为代表的近代民居文化和近代公园文化。现在，宽窄巷子作为历史保护片区正在打造，旁边还有“少城新天地”的打造。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近代公园文化。自清末以来，由于成都满族和汉族的相互交流和融会，满城畛域渐渐泯灭。特别是 1909 年辟少城公园，1902 年至 1904 年建“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自此开启了成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遂出现了近代少城文化。成都公园是成都近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一国之花，都市也。都市之花，公园也。成都少城公园诞生后，即成为成都人民政治活动的舞台、言论自由的讲坛、茶馆游艺的场所、休闲健身的场地。从 20 世纪初以来，这里曾经是议会、工会和商会聚会的场所，也是王右木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五一”节大游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聚会地，还曾是抗议日寇“大川饭店设领事件”大游行的发端地，也是教师“六腊之战”辛酸地的见证。总之，少城公园是近代成都文化的积淀地，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成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成都人在这里上演过不少威武雄壮和慷慨悲歌的历史话剧。国内的通俗教育馆、中正图书馆等传统建筑，是值得保护的中西合璧建筑风的遗留。总之，如从旅游资源讲，今之人民公园，既有近代成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景观环境，又有它非物质文化的精神内涵的积累，正可是旅游文化资源变资本的重要展现地。从这样重要的作用看，“人民公园”之名，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恢复“少城公园”的原名，才能体现它的历史和文化的涵量。

归纳起来，仙游、禅游、诗游和公园游，这就是青羊区旅游

文化最重要的四大特征。而这四大特征，最有新鲜感和吸引力，能引起视角第一冲击力的强烈反应的就是“仙游”——从古蜀仙国到洞天福地的“仙游”，以此为满盆珠玉穿珠的金线，定能使青羊区旅游上到新的台阶，开拓出新的局面。

三、青羊区旅游发展的对策

一是根据青羊区区域旅游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划出不同的有特征的旅游片区，如仙游片区、禅游片区、诗游片区和公园游片区。对这些片区的公共环境和建筑风貌，特别是公众游憩的空间节点，都要考虑本片区文化特色，将其物化为建筑符号、空间符号、雕塑小品符号、壁画符号及各种装饰乃至广告的文化符号，从而显出片区文化特色来。试想，如四大片区的建筑和环境有四大特色，青羊区的面貌将是如何多采，而又赏心悦目，这才叫做区有区的个性，城市有城市的个性，改变目前“千城一面”、“五区共一面”的单调面貌，或者是驳杂无章的环境面貌，实在是势所必行。琴台路建筑体现传统联排店居风格是成功的，但其文化风貌则失之于体现片区区域文化不足，这都还可加以研究。

二是为四大片区，培养精通本片区文化历史内涵的导游。好的导游是旅行者的良伴，不好的导游则引起旅游者的厌恶。现在的旅游培训显得层次甚低，文化涵量和历史涵养不足，可否由政府组织一点高水平的导游培训班。

三是青羊区与其它邻近区市县建立旅游联盟体系，可以是区县之间行政领导的高层联盟会议，也可以是市场运作的企业旅游联盟论坛。这种方式对于发展环线游和环区游将大有好处，对于交流建设区域特色经济和区域特色文化也将大有助益。

（作者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顾问、省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古蜀都邑 金沙遗址

——再记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朱章义 张擎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浪漫主义诗篇《蜀道难》中的诗句,也是古人对古代蜀国历史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流传了数千年,但随着近年成都平原不断涌现的考古大发现,人们正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看法。特别是 1986 年三星堆遗址二个祭祀坑的发现,古代蜀国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明,正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在惊叹古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产生了种种谜团,甚至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星人创造的。

当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在距三星堆遗址仅 30 余公里的成都,发现了又一个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了数千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其中的很多文物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似,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二十一世纪初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当之无愧地评为 2001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一、优越的环境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是四川唯一较大的平原,它是

由岷江、沱江及其支流流出山口的冲击扇连接而成的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这里土壤肥沃，河流密布，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华阳国志·蜀志》在描述成都平原环境时说：“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诸葛亮在流传千载、脍炙人口的《隆中对》中也说“益州（汉代成都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业”（《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远古文化的繁盛提供了物质基础。金沙遗址就位于成都平原腹地的成都市西郊，介于西二、三环路之间，距市中心仅 5 公里，范围 4 平方公里以上。遗址内地势平坦，相对高差不超过 5 米。遗址北侧的郫江故道两岸，发现了抚琴小区〔1〕、十二桥〔2〕、方池街〔3〕、君平街〔4〕、指挥街〔5〕、岷山饭店〔6〕、岷江小区〔7〕等多处商周时期遗址，金沙遗址是这些遗址中规模最大，遗迹和遗物最丰富的遗址。

二、漫长艰辛的发掘

早在 1995 年 12 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金沙遗址范围内发现了大面积的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发现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此后，我们在该区域不断发现重要文物，2000 年在黄忠村“三和花园”基建工地发现一处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布局十分有规律，绝非一般的村落遗址，其重要性仅次于广汉三星堆遗址。所以，我们一直把黄忠村片区作为考古工作的重点，一直期待着重大考古的发现。这样的期待在新世纪的 2 月 8 日变成了现实。在“三和花园”大型建筑基址南侧约 800 米的金沙村，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在施工中意外发现了大量的玉石器、铜器和象牙。造型精美、风格独异的珍贵文物，超越时空的阻隔，将沉睡了三千多年的金

沙文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令人叹为观止。在随后的文物清理和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奇特的遗迹，出土了神面纹玉琮、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等 3000 多件珍贵文物和大量象牙，从而翻开了金沙遗址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新篇章。

我们首先对机械开挖出的散土进行了仔细的清理，发现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 1300 多件。随后对出土玉石器、铜器、象牙的地点进行发掘，又出土了各类文物 2000 余件。与此同时，我们又对磨底河两岸的金沙、黄忠、龙咀、红色、朗家等村进行了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初步确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东邻青羊大道，南近清江路，北过羊西线，西连三环路；大体弄清了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墓地等几大功能分区；对遗址的性质、时代与意义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形态各异的遗迹

1、大型房屋建筑基址。

大型房屋建筑基址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三和花园”工地，发掘面积 2026 平方米，发现 17 座房址和大量的灰坑、墓葬、窑址。其中 F5、F6、F7、F8、F9 为一组建筑，因发掘场地限制，F5、F6、F9 均未发掘完毕。在这组建筑基址中以 F6 面积最大，长 54.8 米（西侧未发掘完毕），宽约 8 米，面积超过 430 平方米，F6 内发现 5 条隔墙，是一座至少有六开间的大排房。这一组建筑基址的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是西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的一组建筑群〔8〕，很可能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

2 祭祀区及祭祀遗存。

金沙遗址祭祀区位于遗址的东南部，隔磨底河与大型建筑基

址相望，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是一个长期使用的专用祭祀场所。已发现祭祀遗存 18 处，祭祀的方式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有的为开挖较深的长方形坑，有的为开挖较浅的不规则形坑，有的为利用当时地面的凹凸不平，还有的为平面掩埋方式的祭祀遗存。祭品有以玉器、铜器为主的，有以象牙为主的，有以獠牙、鹿角为主的，有以石璧、石璋为主的。

6 号祭祀遗存以玉器、铜器为主，平面形状大体为长方形，长 8.4 米，宽 2.4—2.8 米，深 0.05—0.15 米。出土玉器、铜器、石器、金器、陶器、骨器 300 多件和大量象牙碎渣和少量象牙。以玉器为主，近 150 件，器类有玉凿、凹刃玉凿、玉璧、有领玉璧、玉镯、玉璋、玉矛、玉戈等。铜器均为小型铜器，器类有铜铃、方孔铜璧、铜戈、铜挂饰等。

1 号坑和 11 号祭祀遗存以象牙为主，最具代表性。1 号坑为一长方形祭祀坑，该坑在机械施工中已遭到严重破坏，现存部分平面形状呈三角形，残长 1.6 米、坑地平行放置密集的象牙。从断面分析，多达 8 层，象牙最长者近 150 厘米，经初步鉴定象牙均系亚洲象。同时，在坑内还发现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11 号祭祀遗存与 1 号坑相距约 3 米。采用平地掩埋的方式，平面形状大致为长方形，长 2.5 米，宽 1 米，高 1.3 米，面积约 2.5 平方米。出土象牙 15 根、象牙器 12 件、镶嵌玉片的漆器和木胎虎头漆器各 1 件，最大的象牙长 1.85 米。这批象牙是金沙遗址目前发现的个体最大的象牙。

2 号祭祀遗存以獠牙、鹿角为主，也是采用平地掩埋的方式。平面形状为不规则形，东西长约 28 米，南北宽 18 米，面积达 500 平方米，最厚处达 0.5 米。出土了野猪獠牙 1000 余枚、鹿角数百支，还有少量象牙、玉器、美石、陶器等。獠牙都是野猪的下犬齿，不见其它动物和野猪及鹿的其它部位的骨头，我们认为祭祀遗存。鹿角和野猪獠牙的统计数量仅仅是金沙遗址出土

的极少部分，总共有多少鹿角和野猪獠牙，的确是一个未知数。

10 号祭祀遗存以象牙、玉器为主，位于发掘区东北部。仍采用平地掩埋的方式。平面形状大致为长方形，面积约 1.5 平方米。上层平放了 7 根象牙，下层埋有 16 件玉器，其中一件玉璋上雕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这件玉璋的出土对于研究古蜀人是如何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为破解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象牙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3 号祭祀遗存以石璧、石璋堆为主，位于发掘区南部。平面形状不规整，面积近 300 平方米。出土有大中小型石璧、石璋 140 余件。这批文物均为西北——东南向倾斜放置，层层叠压，形成扇状布局。石璋放置在石璧旁，无规律。这种特征与成都平原地势和河流方向、墓葬方向一致。这一堆积仍和宗教仪式活动有关。

四、丰富精美的文物

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器等 3000 多件，以及数十万件的陶器和陶片。

金沙遗址已出土金面具、金带、蛙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鸟首鱼身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盒形器、鱼形金饰等 90 余件。以金冠带、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最有代表性。这些器物在成形和纹饰加工过程中采用了锤揲、剪切、打磨、雕刻、镂孔等多种手法，其制作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

金冠带为一圆圈形，上大下小，直径约 19 厘米、高 2.68—2.8 厘米、厚 0.02 厘米。该器表面由錾刻四组纹饰图案，每组图

案都由一鸟、一鱼、一箭和人头图案组成，和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的纹饰图案基本相同。该纹饰图案构图简洁，寓意深刻。这种图案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装饰图案，应有特别的意义。很多学者认为该图案与古蜀王之一的“鱼凫王”有密切联系，这是不无道理的，也说明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关系。

太阳神鸟金箔为圆形薄片，和现在的剪纸工艺品极为相似。外径 12.5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厚仅 0.02 厘米。我们认为整器表现了古人对太阳的崇拜，中心的圆形象征太阳，其外侧的十二道弧形就是太阳的光芒，弧形的光芒形象地表现出了运行中的太阳的特征。在器物外缘与十二道太阳光芒之间又镂空出四只形制相同的飞鸟，均引颈伸腿，首足相接，张开的喙微微下钩，逆时针同向飞行。中心的太阳及光芒和周边的四只鸟组成一个圆形的极具动感的图案。它构思新颖，独特别致，极富现代气息，是商周时期出土文物的精品，可以说达到了同时期艺术思想的顶峰。世界各地的古代民族都对太阳进行崇拜，这是和古人对太阳的认识有关的，鸟和太阳作为组合成为太阳崇拜的常见题材。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汤谷上有扶木，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的器体较小，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牛首、铜戈、铜璧形器、铜方孔形器、铜眼形器、铜铃、铜贝饰等，很多小型铜器可能是大型铜器的附件。

高约 20 厘米的青铜立人像，造型特征与人物形象和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非常相似，都立于一座上，双手握于胸前。不同的是金沙立人头戴十三道光芒的太阳帽，长辫及腰，手腕上带手镯，腰系带，并插有一柄反映身份与地位的权杖。

把眼睛和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铜眼形器也是金沙文物的精品，全长约 26 厘米、高约 8 厘米。其整体造型像一只鸟，鸟头